

比較文化研究叢書



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

何志平 主編



新世紀出版社



比較文化研究叢書

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

何志平 主編



淮阴师院图书馆1226817



新世紀出版社

A STUDY OF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Chief editor by Ho Zhi-Ping

SUN SAI KEI PUBLISHER (H.K.)

FIRST PUBLISHED: 1991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何志平 主编

新世纪出版社

(湾仔庄士敦道214—216号三楼B座)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324.8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1991年12月出版

ISBN 962—7357—102—W

定价: 10.00元

学术研究文库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卷首语及目录)

主编 曹平南 袁国华 何志平
(按姓名笔划为序)

主 编: 何志平 平 南 平志平 袁 主

副主编: 李 华 南 平 蒋承勇

编 委: 丘上松 刘晓文 刘 辉 陈才宇

黄铁池 谢永新 谢炜如 谭运长

特邀编委: [新加坡] 林文锦 钱超英

撰 稿 人: 丘上松 叶继宗 刘晓文 刘璋飘

陈才宇 张木荣 李 华 陈红蕾

何志平 罗 岗 周明燕 周 颐

南 平 胡志毅 高伟光 钱奇佳

黄铁池 谢永新 谢炜如 蒋承勇

翟永存 谭运长

比较文化研究丛书

《宋明理学文化批判与研究》

(按姓名笔划为序)

顾 问： 王国荣 刘象愚 胡经之 曹顺庆
符玲美

主 编： 何志平 南 平

副主编： 丘上松 李 华

宇木利 文巍波 宗继和 傅士立

谭运长 周永松 潘永彬 黄君黄

英 钱文林 [钱君源] 姜继成

周华波 文巍波 宗继和 傅士立

雷卫澜 卢 李 荣木生 宇木利

周 周 燕明圆 岚 娄 平志平

董奇魁 张寿高 雷志贴 平 南

魏海森 吴敬海 潘永彬 黄君黄

王海潮 吴敬海 潘永彬 黄君黄

目 录

余福新 章六墓 义生玉壤 許一農	(132)
义主臧否 許二農 义主來未 許三農	(136)
義小焉財意 許四農 义主寒暄賦 許五農	(138)
李 裕(1)	《比較文化研究叢書》序
(12)	前言
(15)	第一章 純理論
(17)	第一节 西方現代社會與現代派文學
(22)	第二节 西方現代哲學與現代派文學
(27)	第三节 西方現代美學與現代派文學
(33)	第二章 审美論
(35)	第一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美态度
(42)	第二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美心理结构
(54)	第三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美理想
(63)	第三章 結構論
(65)	第一节 現代詩歌結構分析
(79)	第二节 現代小說結構論
(90)	第三节 現代戲劇結構論
(101)	第四章 比較論
(103)	第一节 比較詩學引論
(117)	第二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平行 研究
(126)	第三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研究
(137)	第五章 接受論
(139)	第一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接受研究
(147)	第二节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中国接受研究

第六章 流派论	(157)
第一节 象征主义	(159)
第二节 表现主义	(166)
第三节 未来主义	(173)
第四节 意识流小说	(179)
第五节 超现实主义	(186)
第六节 存在主义	(193)
第七节 荒诞派戏剧	(199)
第八节 新小说派	(206)
第九节 垮掉的一代	(213)
第十节 黑色幽默	(219)
第十一节 魔幻现实主义	(226)
第七章 个别论	(235)
第一节 艾略特	(237)
第二节 卡夫卡	(243)
第三节 阿波利奈尔	(251)
第四节 伍尔夫	(258)
第五节 勃勒东	(265)
第六节 加缪	(270)
第七节 贝克特	(278)
第八节 罗伯—格里耶	(287)
第九节 金斯堡	(293)
第十节 海勒	(299)
第十一节 马尔克斯	(305)
附录一（研究资料）	(315)
附录二（比较文化研究丛书学人略传）	(385)
后记	(395)

《比较文化研究丛书》序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思考

李 裕

一位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青年，要编一本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书，说是要“过一过主编的瘾”。于是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同行约好，按照他所拟定的提纲分头编写，居然一举成功，这便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当这本书还在编纂之际，他又灵机一动，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一个更大的构想：编一套《比较文化研究丛书》，而《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作为其中之一。他要我为丛书写一篇序，大概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说话，是会支持他的。果真，我答应了。

古来为人作序者，非名士即高官，布衣则鲜矣。这也许是风气所使然吧。所谓攀高仰贵，“喜托龙门”，无论是著者还是编者，几乎无不欲借名人声望以抬高自己，好象一本书一旦题上了名人的雅号就可以声价倍增。而名人们呢？对此大概也习以为常了。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一个人出了名未必会“怕”，因为这通常总是利多弊少的。中国人历来以“立名”为成功之顶极，似乎没有不爱出名的。所以，名人们对于写序之类的事，一可以扬人，二可以利己，又何乐而不为？再说，在名人看来，写序简直易如反掌。君不见，时下之书，序中所云，大都似曾相识。不能说千篇一律，大概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乐为之序”几乎成了既定法式。所谓“名家手笔”，看来也不外如是。我既不是名人，也不

是这一门的行家，可能有人会说我根本不配。所以，此书的编者肯定是沾不到我的什么光的。不过有一点可以奉告：我决不敢连书稿都不看就欣然命笔，信手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字。

本书的主编何志平，和我同在深圳教育学院中文系教书，未及“而立”之年，却早已成家立室，并且有了孩子，自不宜以小辈视之，但他毕竟还很年轻。论资历，尚浅；论成果，并无惊人之作；论才干，似无非凡表现；至于实践经验，就更嫌不够火候了。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丛书之一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要出版了，我觉得，它至少不是一本很差的书。看来，当主编也并不见得非名人莫属。我赞赏何志平敢于实践的勇气，这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优点。尽管他所编的书可能会有不少缺点，但是，敢做、肯做，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我赞赏他的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益，先出的这一册，从组稿、编辑、修订到最后成书，总共才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还赞赏他的实干精神，《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毕竟是他费了功夫一五一十地编出来的。这比起某些空有其名而实际全不参与其事的大主编来，至少要实在一些。

《比较文化研究丛书》将陆续向读者介绍不同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主要方面的基本概况、研究进展和参考材料，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和初步的理论探讨，从而为弘扬中华文化、正确地认识和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之后，也就开始有了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化已经有了大约400万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主要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即民族文化与地域性文化。又由于人类自身和社会生活存在着必然的共性，以及人类在历史上的长期接触、交流与分合，各种文化之间又有着一些共通性和相似性。因此，考察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对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力求作出客观

的分析与科学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统治集团的腐败，中国逐渐贫弱，并且越来越落后，在屡遭西方列强的侵凌之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两种极不相容而实际上都是同样愚昧的思想：一种是无知的固步自封，不明世界有多大，不识今夕是何年，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这除了那些守旧的文人和官僚之外，还有许多可怜的大小“阿Q”们；另一种便是曾经喝过一蛊半蛊洋水的新派文人，还有一些本是土生土长但却不解“祖宗”二字为何意的“假洋鬼子”之类，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月亮也是外国的圆”。

傲慢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常常是不屑一顾的。但在西方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和研究甚至远胜于许多中国人而足以使我们自觉惭愧。

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比较早而又非常深刻的，要算17世纪的德国大数学家、哲学家和作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莱布尼茨。他在发明了二进制的数学方法之后，从拉丁文译本中读到了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十分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人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懂得了运用二进制。从此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筹办了一个中国文化学院，招收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学术，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学院直到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才被纳粹所摧毁。

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大都景仰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孔子的思想十分崇尚。除了卢梭之外，从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到德国的康德，全都推崇孔子。其中最有影响的伏尔泰甚至在家中挂起孔子的画像，如同中国的儒生们那样，虔诚地向他顶礼膜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导源于孔子的“仁”学的。

还应当特别提到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

史家、权威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他费了四十年的功夫，撰写了25卷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惊人的史料和翔实的考据，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从而指出，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也就是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中国的文明，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他断言，当今世界上的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绝大部分都起源于中国或者是受了中国古代发明的启示。美国学者坦普尔在李约瑟的同意下编写成一本简明的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书叫做《中国——发明的国度》，他做了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当今世界上的重大发明，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甚至在今天，也还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史诗”，“中国缺乏人道主义”等等。至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即使那些承认中国文明悠久的人，也全然不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现时代还有什么意义。有些人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把它和“封建”、“保守”、“封闭”、“落后”等联系起来，甚至视为同义词；而另外一些“捍卫”传统文化的人，又往往不是弘扬其民主性精华，而是在颂扬和发展其封建性糟粕。这样一来，以至于那种曾经喧嚣一时的“黄河文明尽头”论、“中国传统早该绝种”论、“亡国灭种”论和“全盘否定”、“全盘西化”论等等，至今还有市场和影响。

古老的中国文化，其精华部分不仅在今天仍有价值，甚至许多东西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中国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例如《周易》和《老子》中关于宇宙和万物生成的观念，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阴阳观念，“有无相生”、“万物混成”的观念等，这些完全合乎自然法则的、蕴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唯物辩证观点的哲学思想，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衡量，还是拿当代最新的学术思潮如耗散结构理论或混沌学说作比较，或者以最新的科学成就（从微

观的高能物理研究到宏观的天文探测的结果)去印证,人们都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些离开我们如此久远的先哲们的天灵盖上,是如此地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易》学在世界上早已成了十分热门的学术,而表示中国自然哲学宇宙观的阴阳太极图又是如此的高深莫测。圆形的图式一分为二,一阴一阳,旋转环合,周流不息,象征着宇宙万物的生成、分合与运动变化。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无限大的宇宙,整个物质世界的构成与变化,就象全都包含在那圆形的、具有旋转的动势的太极图中。它最神妙地体现了物质组合的对立统一和永恒变化的规律,具有特殊的形象性和合理性。难怪布鲁塞尔学派的开山祖、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象供奉图腾似的把它作为个人和家族的徽章。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无以伦比的兵书,而且是一部最优秀而又生动实用的辩证法哲学名著。美国最有权威的军事家们都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军事著作能够超过《孙子兵法》。美国人早就把《孙子兵法》列为高级军校的必读教科书,聪明的日本人则把孙子的谋略用在经济决策和商业竞争上面,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功。

“孔孟之道”,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被解释成只是强调封建统治者的专制和被统治者的顺从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法统,而成了封建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和精神压迫的工具。其实,汉代以后推行的所谓“孔孟之道”,主要是孔孟思想中的糟粕,而且是被大大地歪曲和发展了的。许多东西都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为之效力的腐儒们强加给“圣人”的,是与本来面目的孔孟思想背道而驰的。况且,孔丘和孟轲本人根本就不是历史上人们所摆弄的那个样子。必须指出,孔孟思想的主要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作为他们的思想的基本内涵的伦理观念,实际上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民主性的精华。儒家伦理至今仍在中国人甚至世界上所有华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和探究的文化现象。纵观中

国文化史，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最具有稳定性的部分正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人们往往把这说成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中保守和封闭的落后面过于强大和顽固的反映，在我看来，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能够如此地流行不衰，恰恰证明，它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震荡与冲击，具有不可否认的生命力。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仁”的本质就是“爱”，“爱人”就是爱天下的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表述。孔孟主张“中庸”和博爱，强调重信义，讲道德，有礼貌，守纪律，追求一种和谐纯美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十分富有建设性的一种治世学说。日本人在企业中把这种儒学精神成功地用于人的管理，收到了“能得人死力”的效应。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说，日本成功的秘诀是西方现代技术与东方儒学的结合。我认为，儒家伦理的精华就在于它的人道精神，因为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合乎道义的、真正美好的东西——真、善、美、友爱和亲情，而这，恰恰是古往今来人类所一直追求的最可宝贵的人类精神。

儒家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强调集体；而西方人则重实惠，强调自我。从人的本质和根本理想来看，究竟哪一种精神更值得崇尚呢？我以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有人说中国穷与儒家尚清贫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有关，这也是一种误解。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儒家大师孟子都从未拒绝过利。孔子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说得更清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失之，不去也。”儒家只是拒绝一切不义之利，而决不是盲目的守穷远利。可贵的是，儒家价值观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始终把德义放在第一位，而强调个人的得失应服从于德义。

当今世界存在着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西方社会中文化发展的种种畸形现象是令人十分忧虑的。暴力，黑社会，绑架，

强奸，吸毒，酗酒，卖淫，离婚，性滥交，同性恋，爱滋病，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的毒瘤，都构成了人性的堕落。西方世界自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地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这些人类社会的贊生物，不仅在西方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我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随着商品和文化的引进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今天，在我国，除了官员的受贿、利用职权谋私和种种不正之风外，西方世界泛滥的种种罪恶和糜烂现象，也几乎无所不有。而这一切，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李约瑟早在1963年就说过：“也许，今天不但中国，而且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向孔子、老子和墨子学习。”面对西方世界越来越严重的种种罪恶，国外一些有远见的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也许最终需要中国的儒教来拯救。

西方文学所表现和西方文化所宣扬的所谓新潮观念，有许多都是腐朽的东西，比如“个性的绝对自由”、“性解放”，还有“同性恋”，其实这些恰恰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死敌。

性禁忌是早在原始社会就发展起来的一种行为规范，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进步意义。假如没有性禁忌，人类就不可能进入文明社会。儒家伦理中对于男女关系方面的严格规范，不仅不是什么对于人性的禁锢，而且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恰恰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约束性的文明法规。我认为，在性方面，人类是绝对不可以放任和自由的，没有必要的行为禁忌和社会道德规范，人类自身就不可能有进化和发展，“性开放”或“性自由”是一种倒退而绝不是什么新观念，是连原始人都不如的一种倒退。乱伦将导致人种退化，性滥交带来的后果是性病蔓延，爱滋病肆虐，人类如果对自己不加约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因此而最终会毁灭人类自身。

同性恋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获得立法承认，压制同性恋被视为违反人权的非人道表现。在我看来，同性恋是社会畸型和人性

变态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就是非人性的。承认同性恋实际上就是放任非人性行为。同性恋的历史也许比卖淫更加古老，但它在过去从来都是被道德和法规所禁止的。同性恋本来就是动物所不为的变态丑行，西方的同性恋者不仅不以为丑，反以为荣，甚至公开地游行集会，在纽约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发表宣言。如果人类都象他们那样发疯了，试问，社会还能存在吗？人类还能延续吗？连人类都绝灭了，那还有什么人性和人道？尽管同性恋行为可能有某种生理上的原因，甚至在历史上某些同性恋者还是天才，但如果因此而承认同性恋的合法性，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就等于是鼓励堕落和自杀。

什么叫自由？人类社会在任何阶段都是有组织的，连许多种类的动物都过着社会化的生活。没有约束就不可能有社会，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能允许有绝对的自由。问题在于，那种约束、那种规范是为谁服务的，是维护统治者的专制和狭隘利益的呢，还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孔子提倡“天下为公”，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表明孔孟思想充满着人民性和民主性。

在文学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学的成就比不上西方文学，这同样是偏见。欧美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有独特的理解。譬如，美国很有代表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克劳迪·格伦说：“只有世界把中国和欧美（包括英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文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而法国享有盛名的比较文学研究家艾登堡则说：“整个比较文学的方向应当转向东方。”他提出：“中文应是比较文学者的国际语言”。他对明清小说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没有读过《西游记》，就象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样，不能谈小说理论。”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足以进入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伟大的名著之列。就拿《红楼梦》来说，作为长

篇小说，它绝不仅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思想内容的丰贵性、深刻性诸方面，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简直称得上是清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人民性和民主性。在艺术方面，它又是那样的完美、精湛、纯粹而又多姿多采，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性，它的成功和魅力完全可以用“登峰造极”来形容。在我看来，《红楼梦》在创作方法上，仅仅用现实主义是不足以概括的，实际上，这部作品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明显特征。在评价其成就时，拿它同欧洲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任何一部杰作相比，都将毫不逊色，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成了专门的学问，而如今世界上，尤其在日本和欧美，“红学”也已是文学艺术研究的热门学术了。

在我国文学史上，史诗确实比较贫乏。《诗经》保存了少量的周民族史诗，但比起“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英雄史诗来，无论在规模、气势和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如西方。虽然如此，但我们是大不必因此而感到自卑的。我国有完整的、系统的历代史书，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的，而且许多史书同时也是文学作品，诸如《左传》、《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全都是文学名著。这也许正是我国史诗贫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一个文学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从十一世纪以来，在我国藏族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英雄故事，就是《格萨尔王传》，它是以民间说唱形式流传的，藏族有专门的说唱艺人，还有各种手抄本，并且在蒙古族和土族中也广为流传。国内有汉、蒙文译本，国外有俄、英、法、德文节译本。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而且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诗中歌颂的格萨尔王是一个与人民一起同恶势力英勇斗争的英雄，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朴实生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的伟大诗篇。但是对于这部史诗，虽然解放后国内有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可至今却鲜为人知，在中国文学史中根本没有提及，

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甚至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也无声无息。最近有过一部电视剧，似乎也没有多大效应。然而在国外，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却颇有声势，甚至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专门学术，叫做“格萨尔学”。看来，我国学术界对此真的要闻而自愧了。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中，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耐人寻味的问题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中国人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珍宝，甚至连祖先传下的真正珍贵的遗产，也不懂得它有何价值，反而要等到外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做出成果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或者大吃一惊。从这一点看，如果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劣根性的话，这就是近代以后才蔓生起来的一条可悲的根，它与古老的封建专制和固步自封的朽根同样地坏。

在中国文学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这表明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我国一些有点成就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立志要向诺贝尔奖冲刺，正在竭力探索“走向世界”的路。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作家的创作动机。在所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争夺诺贝尔奖而创作的。这里，作家自身的素质是最重要的。作家的创作反映了他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和理解的程度，越是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人，就越不会想到他自己。因此，我敢断言，那些朝思暮想要得诺贝尔奖的人将永远与诺贝尔奖无缘。第二，怎样才能“走向世界”，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具有世界性呢？是描写中国人的西化生活情趣吗？是在艺术上体现欧美风格，模仿欧美现代派的创作技巧吗？不，我还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那些真正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反映了本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用本民族的语言表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的作品，才有可能登上世界优秀文学的殿堂。
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人文科学新思潮的涌现，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边缘学科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重视